不一樣的銅鑼灣*

文｜鄧芝珊｜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　譯｜劉佳旻 翁筠婷
圖片｜作者提供

香港，經常被貼上「後殖民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標籤，投射出一個複雜的現代都市形象。作為過去的英國殖民地，人們總是期待能在香港找到更多的建築結構向我們訴說那一百五十五年的時間與歷史。人們可能期待有更多的記號來標誌這段異己殖入的過程，以及有更多方式來保存這些故事使之完整無缺，包括那些鮮活的掙扎與緬懷不去的回憶。但是到底要記住什麼呢？是對歷史的珍寶，還是對歷史的嘲弄？

過渡時期通常意味著送往迎來。統治政權遞嬗、官僚揮手告別，而焦慮的群眾對著未知的未來鼓掌。舊屋子被拆除，讓道給嶄新的建築。新公共廣場的成立目的是建設創新輝煌的未來。新的購物中心承諾著將帶來更為蓬勃的消費。新的地鐵站日出康城（LOHAS Park）並非因為其原有鄰近社區得名，而是與車站所在地的新物業發展同

* 作者附註：本文重新改寫自刊登於第四十九期《女流》雜誌的〈女同志的銅鑼灣〉一文。該文的完成感謝林紀萱的中文輸入以及金曄路的編輯。同時本文的改寫，也必須感謝翁筠婷與台大婦女研究室，以及劉佳旻、翁筠婷的翻譯。

名。[1]然而過渡期並沒有明確的結束。它持續被那些各自對「何謂變遷」形塑出自己在地意義的人們所打斷。

香港，充滿著轉變。

我在2003年夏天回到香港。離開香港十四年後，我雖然回到了自己成長的城市，但卻對它當下所展示的地景覺得陌生。在這裡我沒有什麼認識的人，並且對它的文明建設展現出過度的天真。我花了一整個夏天只是背著登山背包散步；在巷弄間，在城市大街上，以及小店林立的街廊之中。為了避開大型購物商場中的十五度冷氣，我躲進銅鑼灣的維多利亞公園。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看起來必定像極了一個待業的、不男不女的小流氓，或者是一個有著大把閒時間、漫無目標的人。

銅鑼灣是一個密集的都市空間。歷史上，它是英國貿易公司選作辦公室的首要位置，因此比起香港其他地方，它維持著較高的地價。目前，這地方的一樓辦公室租價仍然位居國際房地產市場中的前五名。然而銅鑼灣並非只是全球產業大亨與商業機構的匯聚地，它同時也是一個以不同原因吸引著不同社群的地區。住在香港島那邊的年輕人總是習慣約在這裡逛街，或者在二樓的咖啡店消磨時間；來自菲律賓、印尼與泰國的外籍移工則是在星期天或國定假日，群聚在維多利亞公園，以及人行道、小型休憩區等公共場所。有著同性情欲的香港女性、或者各種性別認同的女同志，像是*TB*、*TBG*和*Pure*[2]，在這個區域到處

1　譯註：「康城站」（LOHAS Park Station）是香港地鐵將軍澳線在新界端的其中一個終點站，而車站上蓋目前正在發展港鐵公司迄今最大規模的上蓋物業發展計畫：「日出康城」。其為一個包括住宅、商場、公園的綜合物展計畫，位於香港新界將軍澳86區，前稱夢幻之城，後更名為「日出康城」，根據物產公司的說法，「日出」代表東方、陽光及朝氣，「康城」代表健康之城和可持續發展性。英文名稱為「LOHAS PARK」，LOHAS即為「Lifestyl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之縮寫，意指健康及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在台灣多譯為「樂活」。

2　譯註：在香港的女同志社群中，TB為tomboy之簡稱，意指性別氣質較陽剛的、打扮較男性化的女同志（類似美國的「butch」，台灣的「T」）；TBG為tomboy's girl/girlfriend之簡稱，意指性別氣質較陰柔的、打扮較女性化的女同志（類似美國的「femme」，台灣的「婆」）。Pure則接近為台灣女同志社群中的「不分」，指不特意區分TB/TBG，或介於兩者間的性別角色。

▲三樓窗外掛著六色彩虹旗的小店，就是銅鑼灣女同志常去的咖啡廳。（鄧芝珊攝）

可見，並總是高調地牽著手，自在地做自己。

每一次去銅鑼灣，也會給自己定下一連串的目標。原因很簡單，我要用最短的時間穿梭於我最熟悉的街道小巷，來完成我的購物清單。若時間許可的話，我會選擇上我最喜歡的*Les*[3]咖啡館歇一下，喝一杯凍朱古力，好好享受一下短暫的寧靜。從這間位於四樓的咖啡館的露台望下去，會看到銅鑼灣一個非常繁忙的十字路口，潮水般的人群周而復始地先在十字路口上停留數秒，然後一起衝往馬路的另一邊。

這個場面體現了這個城市的節奏。

這個場面體現了我與這城市的斷裂。

不管我行走的速度多快，我似乎都無法跟上它的步伐。我似乎只差那麼一小步就能趕在紅燈亮起前過馬路；或者話講得就慢了那麼一點，而不能讓別人瞭解我真正想說的話。又或者，就這樣錯過一個最新的政治玩笑的梗。

我已經接受了這個事實：對這城市來說，我太緩慢。

銅鑼灣的特殊性在於它既是高密度商業化的地區，同時也是住宅區；而對很多人來說，更是下班放學必經的地方。換句話來說，銅鑼灣的日常作息，主要是建立於商業模式的運作上，而且是資本主義脈絡下的一種空間展現。我對香港與其整體環境的瞭解，就如同Rosemary Hennessy（2000）所描述的，是一個「資本主義以複雜的結構整體運作」於其中的資本家計畫。透過政府為了商業物產發展而「更新」舊街區的都市重建計畫，可看出此資本家計畫在香港都市空間的表現形式。經由政府推動市場自由與競爭的政策，資本主義已經找到它滲透日常生活的方式。由此，政府的當責能力被降為個人責任問題，對個人成功故事的希望被扭曲，而違反經濟邏輯的另類價值則被消滅。每個政策決定都被精確計算。每個舉動都被策略化。每個訊息都必先經深謀遠慮。它是一個意識型態的陰謀，設計來阻絕規範之外的思考，壓制異議，並建構霸權性的一致同意——為了所謂的，香港「更好」的未來。

對許多住在香港的人來說，消費主義無疑地已經成為日常實踐的一部份，並且對許多無法負擔消費的人來說，這種「必須消費」的宰制性壓力意味著對中產階級價值的服從。呂大樂與王志錚（2003）在《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中提到，充斥在香港中產階級之間的一種普遍意識型態是，把握機會是個人的事，個人必須自己主動去爭取那些機會，並積極利用這些機會來改變個人的命運。並且，中產階級相信這個城

3　譯註：Les是香港對「女同志」的特殊說法，來自英文lesbian，近似台灣的「拉子」。

市所能提供的許多可能性：這意味著，如果一個人工作夠努力，就能得到階級上移的公平機會。這聽起來或許不是一個觸目可見的現象。但更重要的是，此書中進一步地提到，這個中產階級意識型態影響了不同階級的人，並且成為香港人的一種標準志向（normative aspiration）。換句話來說，中產階級的目標及其價值成為履行公民身分所渴望的路徑。這意思並不是說每個人都渴望成為中產階級，我試圖想指出的是，對某些女同志來說，的確有表現出這種要做出符合中產階級之外表舉止以避免更多質問的必要性。這個符合中產階級價值的外表舉止可以讓一個女同志得到足夠的信賴，使她「作為一個慾望同性關係的女人」比較不成為問題，至少暫時地，更容易得到廣泛的接受。

一個跟我討論關於香港同志研究的人曾經告訴我：「對香港人來說最令人害怕的事情是承認自己很窮！」她在我們討論「網路上出櫃的後果」的對話中提出這個說法。她認為，承認自己是個「窮鬼」或「窮*Les*」，比以「女同志」身分出櫃的創傷還大。如果我把這當成一個經過考驗的說法，那麼，是「羞恥感」或「面子」問題使得香港人不願承認自己窮嗎？承認自己是一個有同性慾望的女人，是否比承認貧窮要來得不那麼具威脅感呢？

也許現在正是時候去重新評估、重新連結，並重複討論幾個連結點之間的關係：城市中稠密的都市空間、強勢宰制的中產階級意識型態、資本主義以及*Les*慾望。我對銅鑼灣這地區的興趣，源於身邊的朋友們常常約定在該區的某一間餐廳、某一幢大廈裡的咖啡店、某粉麵檔前面或某一間商鋪內見面。銅鑼灣是一個在大眾運輸上最方便、能夠連結城裡最多地點的地方。這延伸到下一個問題，就是銅鑼灣對*Les*的特殊性。這個地區似乎集合了一些專門提供*Les*服務的商店，雖然數目不算多，但是總會有一、兩間女女咖啡店或酒吧，還有一間剛開張不久的、讓*Les*看DVD、唱K的商鋪。回想1990年代，那時至少已經有五家專屬女同志的卡拉OK酒吧，其中大部分都是開開關關，並且在任何時間都可能重新開張。

這些不只是一般的商店，或一些隨著社會對同志議題比較敏感而崛起的商業機會，這些空間更為*Les*提供了一個可以脫離社會約束的暫時性空間。無論妳／你是不是一位認同*Les*身分的女人，妳／你都可以選擇在這些特定的空間內稍為放肆一下。我說的「暫時性」，是指*Les*商鋪在租金高漲及其獨特的經營模式下的困難，商鋪往往因為這兩個原因而倒閉。而「放肆」則是指向同志對社會約束的一種抗爭——一種隱含於日常生活實踐中的抗爭。這種抗爭形式是在大環境所施加的種種條件之下實踐體現的。也就是說，這並非是一種對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的沈默屈從，而是必須理解

▲銅鑼灣的日常街景。（鄧芝珊攝）

成一種由香港的*Les*們創造出來，維持並支持（maintained and sustained）著的條件性空間（conditional spaces）。

這些空間中附加的條件不只是經濟因素，同時也投注了情感與社會關係。這些條件通常充滿了漏洞與裂縫，允許多樣的作用力得以有意識、無意識地穿流而過。近似於酷兒情欲及性親密感的概念，正是在酷兒空間不連續的敘事中，我們才能為新的故事畫出新的路線。

另一方面，當我在喝凍朱古力的時候，我所付出的三十六元也讓這一種抗爭加上了一個價格。這種消費／抗爭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負擔得來。這種酷兒消費的概念並不新穎。已經有許多針對女同志、男同志、雙性戀與跨性別（即，LGBT社群）的研究聚焦在大都市中心的酷兒消費，以及這種消費對LGBT社群中社會階級的影響。學者們對於酷兒消費潛力導致主流對LGBT社群的接受度，以及那些無法負擔消費的族群被邊緣化所造成的潛在危機意見分歧。這並非只是誰收入較高這樣的簡單問題，同時也是關於誰能有比較足夠的文化資本（以Bourdieu的詞彙來說）來建構某種形象。一個人不但需仰賴物質條件才能在社會階層間流動，同時她／他還必須感到理所當然地擁有此社會位置。建立這種理所當然的優越感並非個人之事，還必須透過持續不斷地參與各種社會關係來獲得。而在這理所當然的權利概念中亦存有錯綜複雜的階級宰制。

像我就曾經在不同的位置間感到分裂。我支持LGBT的商店，就算我知道我正在咬的雞翅夠我買一碗樓下麵檔的魚蛋麵。我會帶我的朋友與海外訪客去那些特定的*Les*店鋪，希望它們還開著。但是，最酷兒形式的消費是假設它會發生在任何地點、以任何形式。那麼接下來一定會冒出來的問題就是：誰可以永遠負擔這個消費者的角色？如果所有東西、任何東西都可以「變得酷兒」，那麼在這樣的酷兒消費行為中我們必須付出什麼代價？就算只是考慮把這兩個詞

彙一起放在日漸消頹的酷兒政治面前，不是很諷刺嗎？或是，在這種情況下，酷兒政治在地化可以為酷兒消費成為香港LGBT社群政治能見度之一環提供更合理的論述嗎？

我沒有答案。我所能想到的是，作為一個酷兒消費者同時在實質上以及情緒上都要付出代價。實質上，這是因為你真的必須賺足夠的錢來參與巨大的新自由主義體制。情緒上，則是因為你必須交換情緒勞務（emotional labour，以社會學的詞彙來說）才能維持作為一個消費者。就如Eva Illouz（2007）中肯所言，資本主義並沒有發展出「冷漠情感（cold intimacies）」，相反的，它有助於創造一種「情緒資本主義（emotional capitalism）」，「其中情感已成為一個經濟行為的基本面向，在這種經濟行為中，情緒生活——特別是中產階級的情緒生活——是遵循著經濟關係與交換的邏輯（頁5）。」蔡明發（Chua Beng-Huat）提到，為了經濟繁榮而以政治自由的「契約」形式作交換，似乎在半民主或類獨裁的東亞、東南亞政府間很常見（2000）。這並不是說每個人都願意訂約遵守，而是若不去遵守的話則必須付出更多，作為異己本來就是需要更大賭注的事。一個人可能最後失去遠多過於她／他所能負擔的損失。

我每次約朋友到這些咖啡店時，也不期然地會擔心它們的持續性，我會一次又一次嘮叨地向店主發問一些關於營運方面的問題。因為這些空間的持續性對我來說已超越了純粹消費的層次，它們是一個性／別身分的政治性空間。雖然我知道不是每一位*Les*都會認同我的看法，或會像我這般重視這些空間，但是我們必須明白這些辛苦經營的空間在同志歷史中扮演的關鍵性角色。每一次當我走進了那幢在繁忙的銅鑼灣街頭大家都不會注意到的舊樓的狹窄入口，開始舉步維艱地爬上又斜又窄的梯級，一路喘氣一路暗罵自己不爭氣的膝蓋，好不容易爬到了咖啡店的門口，我總會鬆一口氣地說聲：「終於到了！」因為過程中的艱辛，那得之不易的感覺，讓我更珍惜它的存在。

因為太容易就會把這些空間視為理所當然了。

因為太方便就會和狹窄的入口擦肩而過。

*Les*的商業和社交空間，在一個極度商業化的社會中是不容忽視的。這些空間的存在性往往不斷地被質疑，不斷地被邊緣化，也不斷地被視為是缺乏競爭力的失敗商業模式。這些*Les*空間的生命周期是短暫的，很快就被商業叢林中的殘酷競爭而淹沒，但又生機勃勃地驅之又來，展現頑強的生命力和適應力。這種枯竭與存活的節奏幾乎提醒了我們——許多女同志、男同志、雙性戀、跨性別者與酷兒所必須經歷的每日生活仍然存在著。而這種生存本能，這種不被

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打發掉的迫切感，並非只私限於LGBTQ族群，它同時也為在空間中被排除的族群發聲，比如非商業藝術家、注射藥品者、獨立製片者以及性工作者。

隨著香港社會對同志慢慢步向理解，這些空間會不會因此失去了它們的存在意義和需要性？這點我無法作出預測。但肯定的是，銅鑼灣的多元性與複雜性，使這個地區得以成為*Les*及菲印勞工等邊緣社群願意聚集的一個公共空間。這亦說明了為什麼過去四年的「香港國際不再恐同日遊行」，也選擇在銅鑼灣東角道行人專用區舉行，讓一個平常的消費性空間在短短數小時內變成一個爭取性／別平等，性權利與市民權利的空間。

引用文獻

呂大樂、王志錚（2003）。《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香港：三聯書店。

Chua, Beng-Huat. (Ed.). (2000). *Consumption in Asia: Lifestyles and identities*. London: Routledge.

Hennessy, Rosemary. (2000). *Profit and pleasure: Sexual identities in late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Illouz, Eva. (2007). *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 London: Polity Press.